

海洋、海圖、海疆：全球、臺灣、海洋

盧正恒*

本次獲邀在「全球視野」下書寫。原欲書寫一篇有關海洋史之重要性的倡議與反思，但總覺得不夠周詳。思來想去後，既然是有關「全球視野」，何不把近年來筆者有關十九世紀初期俄羅斯環球航海的研究進行更精確的論述呢？¹俄羅斯是近年來世界地緣政治與國際局勢發展的要角，尤其在 2022 年烏俄戰爭爆發後，更多次躍上臺灣新聞版面。在歷史學研究中，已有諸多鑽研俄羅斯史的前輩學者，清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學者曾經針對十七到十九世紀清俄歷史互動有過細緻分析，多數聚焦在恰克圖貿易、準噶爾戰爭、東正教，還有十九世紀中葉後，在所謂「列強」概念下雙方互動之分析。不過，綜觀各種研究中，似乎較少聚焦雙方在海上的交流。

今日學界 maritime history 之譯詞為「海洋史」，藉由比較或交流角度、超越國家邊界，理解人類與海洋的各類關係所創造的歷史，並藉由海洋視角進行分析。²臺灣海洋史源自臺北帝國大學時期南洋史學講座，當時的多語言史料傳統於 1984 年，在已故曹永和院士獲聘進入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中心為標誌性瞬間。自此，學者們熟稔地運用荷蘭文、日文、英文、西班牙文、法文、甚至是閩南語等，這些曾與「海洋活動」高度連結的語彙史料，成為臺灣海洋史之特色。一方面豐富臺灣、中國、東亞海洋史內容，另一方面也擺脫漢文史料中心主義資料，進而提供更多元的視角和觀念。³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¹ 筆者近年來研究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部分：一是利用滿文材料認識清帝國。二是利用歷史人類學的方法調查臺灣西海岸的濱海社會。最後則是本文所提及的俄羅斯環球旅行的調查。

² Gelina Harlaftis, *Greek Maritime History Steaming Ahead*, in Gelina Harlaftis & Carmel Vassallo edit, *New Directions in Mediterranean Maritime History*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11; Malcolm Tull, *Maritime History in Australia*, in Frank Broeze, *Maritime History at the Crossroads: A Critical Review of Recent Historiography*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

³ 參見周婉窋 (2018)，〈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專攻及其戰後遺緒 (1928-1960)〉，《臺大歷史學報》61 期，頁 17-95；林文凱、許雅玲 (2015)，〈專訪張彬村教授〉，《明清研究通訊》50 期，https://mingq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387 (2026 年 8 月 12 日瀏覽)；何幸真、吳宓苓 (2016)，〈張彬村教授訪談〉，《季風亞洲研究》2 期，頁 218-219。

只是，每每當我們習慣特定語言史料似專屬於某一領域時，也易忽略其他可能性。例如——以筆者自身另一研究為例——自 1980 年代以來被冠上「新清史」的研究範式主張利用非漢文材料，通過內亞史、帝國史、世界史的視角來理解清史，無論此研究方法產生多少爭論，不可否認的是其改變我們對於清代歷史的理解和想像。⁴不過，一如海洋史研究，多語言史料創造了無限可能性，但當偏頗地認為某一種史料專屬於特定區域的研究，反而限縮開創的契機。⁵

筆者於一次意外機會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見到一幅形狀迥異的福爾摩沙地圖，上頭文字卻是用俄文標示。基於歷史工作者的好奇心，筆者展開了初步的瀏覽與研究。這幅地圖是繪製、收錄在 1820 年代的地圖集中，繪製者是一位名叫亞當·約翰·馮·克魯森斯坦 (Adam Johann von Krusenstern, 1770-1846) 的俄羅斯艦長。攤開他最著名的肖像畫，會發現他端坐甲板上，手持望遠鏡及一幅今日稱為北海道地區的地圖——這類畫作往往手持物品象徵著其生涯最重要的成就。濃厚的亞洲元素，讓筆者對於這位「俄羅斯艦長」產生了高度興趣，因此展開初步探索。意料之外的是反而促成利用海洋史上較少見的語種史料，從而理解臺灣乃至於東亞世界在十九世紀初的交流歷史，並得以從地方和全球的雙重視角來觀察歷史脈動。

雖主題為「全球視角」，但或該先從「地方視角」切入。由於克魯森斯坦該次航程曾踏足空間廣闊，不易從聖彼得堡、哥本哈根、巴西、夏威夷、長崎、廣州等逐一梳理，因此筆者希冀用臺灣讀者較熟悉的蛤仔難（即是日後的噶瑪蘭，今日宜蘭）作為開端切入。十八世紀末，以新莊為據點的富商們提供豐沛資本，資助東北角地方頭人之一的吳沙越過番界，進入蛤仔難開墾。經過多年的經營，在拓墾者、資本家的積極奔走倡議下，加上海盜多次進入深水海域進駐蛤仔難甩開大清水師，最終經過中央官員與地方官員的介入，大清經過數十年後終於又「擴張」其疆域。此次拓展是極具指標性的：從臺灣史的角度來說，這是一次重要事件；以清史來說，不僅是大清帝國接觸到直臨太平洋的深海海岸，更是「乾嘉變革 (Qianlong-Jiaqing Transition)」的一環。不過，這些大概還是限縮在某種程度上的「民族史觀」；若從更宏觀的視角，可以看到什麼呢？當克魯

⁴ 近日有一篇相當重要的回顧，可供參考；見 Wei-chieh Tsai. (2026). The New Qing History Revisited: Its Background, Controversy, and Development Since 2010.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33(1), pp. 115-142.

⁵ 相關研究可參見盧正恒 (2024)，〈海國製作：地圖舊知新製與滿文中「海」、「洋」變換〉，《成大歷史學報》66 期，頁 127-174；Cheng-heng Lu. (2026). Legitimacy from Seas: Surveying, Mapmaking, and Cosmology of Manchurian Sea Space during the Early Qing. *Crossroad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Asian Interactions*, 24(1-2), pp. 1-37；盧正恒 (2026)，〈製作與想像海疆：《北洋海岸圖》與金國時期的海域認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31 期，頁 1-54。

森斯坦那艘購自漢堡的英國二手船艦、名為「希望號」的旗艦，正航行經過東亞海域的庫頁島、福爾摩沙島等地時，當中經歷的也正是諸國重新定義十九世紀東亞海疆的時刻。

濮德培 (Peter Perdue) 在其著名的《中國西征》(*China Marches West*) 一書中，詳實地考察準噶爾帝國、大清帝國、俄羅斯帝國在十七到十八世紀時，於內陸亞洲的軍事、政治、外交互動，探索長達百年歷史，認識「新疆」為何成為「新疆」。又如紀若誠 (C. Patterson Giersch) 的《亞洲界域》(*Asian Borderlands*)，聚焦西南地區，多股勢力互動和交流進而定義邊疆。這些研究都能權作參照，從這一點來說，福爾摩沙不僅是臺灣或清史的一部分，更該成為宏觀歷史的一環。確實，克魯森斯坦的目標從來不是登陸福爾摩沙，而是要確定東海岸、臺灣南端、最後繞過前往廣州。噶瑪蘭不是他所關懷的區域，但卻是他在 1820 年代繪製地圖的重要環節，此後在 1820 年代以後出版的歐洲地圖中，臺灣的四極點（東、南、西、北），以及東海岸乃至於恆春半島、蘭嶼、綠島、七星岩等地的經緯度與輪廓，都需要歸功於這位俄羅斯船長的調查，並且居於十九世紀全球領導地位。

這段歷史是偶然發生？僅是共時性嗎？固然如此，但也不是如此。把焦點從熟悉的中國史挪到日本史上，克魯森斯坦整趟旅程受到帝國交辦任務之一，就是要送還因故漂流到俄羅斯的日本人，從而建立與日本直接的外交、貿易管道。但是對於鎖國時期的幕府來說，俄羅斯人的來訪意義不明確，導致雙方產生了許多的衝突，送還的漂流民更曾遭受到非人對待與歧視。⁶ 即便俄羅斯船隊離開返回堪察加半島上的據點，二國之間的對峙也未停歇，更爆發了 1806 年的「文化露寇」事件，某種程度上更積極地促使德川幕府向北蝦夷（包括千島群島與庫頁島）探索及地圖繪製。十九世紀第一個十年，歸功於間宮林藏等人的調查，原先在日本地圖上輪廓模糊的北蝦夷地區，忽然變成接近今日所理解的島嶼形狀。克魯森斯坦本人的企圖並非建立殖民地（這是帝國想要的），他希望重新探索太平洋和世界，確定每座島嶼輪廓和位置，希望如他這樣走在第一線的航海家，不再受到傳說、想像及坐在昏暗書房中紙上談兵的歐洲地理學家之輕視和影響。除了日俄外，拓墾者吳沙等人與其繼承者們，大量畫製基於同一母本的蛤仔難地圖，隨後大清官方更以這些地圖為底製作，讓十九世紀的大清帝國重新繪製、出版各種過去的地圖，其中也就包括新納入疆域的噶瑪蘭，例

⁶ 筆者於 2026 年 2 月前往仙台進行調查時，在奧松島繩文村歷史資料館見到當時隨船日本漂流民太十郎留下的俄羅斯軍裝。對於筆者而言，想到的是在庫頁島上與克魯森斯坦見面交換清廷貢貂賞烏林制度下，費雅喀酋長用來與俄羅斯人交換物資的「蝦夷錦」；該酋長穿著錦服的圖像則由當時隨船的重要博物學家提勒修斯 (Wilhelm Gottlieb Tilesius, 1769-1857) 所畫。

如今日收藏在臺灣歷史博物館被命名為《19 世紀臺灣輿圖》的地圖即為其中一例。⁷

當日、俄、清有關海洋疆界上的各種地圖，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時，在帝國與帝國交界中，兩股國家力量如何在海上決定彼此界線何在？換言之，十九世紀的「海疆」是如何出現的？當時踏上庫頁島的俄羅斯人做出結論：該半島（這是當時歐洲的認知）屬於韃靼人的範圍，即便北京可能不知道該處有韃靼人居住；島嶼南方則是日本的「殖民地」。據此，俄羅斯決定不要對此區有更多的遐想，以免讓北京朝廷產生誤會，進而影響當時正在恰克圖的另一群使節團有關兩國貿易的事宜——歸根究柢，還是商業緣故。同樣地，德川幕府後來所畫的地圖上，同樣指出庫頁島北部為大清所「屬」，南方則為日本所管理。地圖的繪製讓三個國家各自用自己的方式釐清庫頁島的輪廓，並且從與當地人群或是官員對答中，得到了屬於自己國家的答案。也就是說，海疆是被各種地圖和知識所建構出來的，讓庫頁島在十九世紀中葉初期成為一段充滿圖像和知識的故事。

除了國家因政治、經濟、外交等因素，扮演的角色外，「地方」同樣重要。在臺灣，「地方」應該是展現在「海盜」這個群體上。某種程度上，海盜很可能是俄羅斯和大清帝國在海上唯一的共同接觸者；這群海盜在克魯森斯坦繞過恆春半島前往廣州的路途中，曾在福建、廣東交界的海域上企圖包圍希望號，即便當時克魯森斯坦甚至認為他們僅是為數龐大的漁民。數年後，同一批海盜進駐蘇澳港，並在隨後為當地的開拓者聯合清帝國的水師擊敗，成為納蛤仔難成為帝國疆域的契機之一。彼時的克魯森斯坦正經歷拿破崙戰爭結束後，準備著手將他的心血結晶出版，並且將蘇澳港畫在他的福爾摩沙地圖上。

從傳統中國史的視角下，向噶瑪蘭開墾似乎是獨屬於臺灣、具有經濟導向色彩的故事。對彼時德川幕府來說，向蝦夷北部並且延伸到樺太地區的拓展，也是經濟驅使。對於俄羅斯而言，資助這次航行也是為了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和可能性，包括建立堪察加到廣州的貿易路線、與日本的貿易可能性等。這些活動同時引發三國有關海洋邊疆地圖繪製之「運動」，此運動把東亞海域上的海疆無形中通過地圖繪製知識的匯集所形塑，從庫頁島一路到福爾摩沙。同時，對於地方上的人群，新來到的人群和既有原住民之間開始有了各種接觸。因此，若擺脫地方視角，或臺灣史、中國史研究脈絡，把臺灣當作世界的一環，置於宏觀的視野下思考，強調全球史研究的比較和連結取徑之重點，將有看到更多相似性的全面觀察。⁸

⁷ 相關研究可參考盧正恒（2023），〈步入界外：嘉慶朝蛤仔難地圖繪製及其知識傳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22 期，頁 1-58。

⁸ Richard Drayton, & David Motadel. (2018). Discussion: the futures of global 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3(1), pp. 1-21.

1990 年代，曹永和帶入「年鑑學派」的長時段概念，提出「臺灣島史」，點明「海洋會隔絕外界，也能連接外界」，海洋史的效用和基本問題則是：「每一個時代，臺灣島是如何透過海與外界聯繫？建立的是何種關係？這個連接對臺灣有什麼影響？」並指出：「在臺灣島的基本空間單位上，以島上人群作為研究主體，縱觀長時間以來臺灣透過海洋與外界建立的各種關係，及臺灣在不同時間段落與世界潮流、國際情勢內的位置與角色，才能一窺臺灣歷史的真面目。」⁹簡言之，臺灣固然獨特有趣，尤其對於生長在這塊土地的人都必須要熟悉；只是臺灣同時也是世界歷史發展的一部分，必須要用更巨觀的視野同時理解全世界歷史的動態。

需要強調的是，不是因此就忽略地方上的各種細節。實際上，在沒有針對地方鉅細靡遺研究前，全球史研究可能都是徒勞無功的。臺灣史其實是成為聯通全球歷史的重要「媒介 (agent)」。¹⁰唯有更仔細、細緻的討論與考證，才有可能在各種細節上發現共同、共時性；也唯有這些共同和共時性，可以讓歷史有全面想法，從而提出詮釋。

最後，回到海洋史。正如唐獎得主斯波義信 (Yoshinobu Shiba) 所言，海洋史是通往全球史的方法之一。¹⁰不過並不代表海洋史就附屬於其下。可以肯定的是海洋史有獨到的環節和內容，藉由觀察海洋與人類歷史的發展和互動，以海洋視角出發，如此一來才能夠擺脫「涉海史」的危機。¹¹多語言史料一直是海洋史引以為傲的部分，如何把更多過去較被忽略的語種史料納入海洋史中，定會讓海洋史研究更加生色和多元。因此，如果要在這進行一個簡單的結論，筆者會希望未來的海洋史不僅能夠真正的理解海洋，也要更多元多層次的納入不同的史料和學科，從而豐富我們的海洋史研究。

⁹ 曹永和 (2000)，〈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臺灣島史」概念〉，收入氏作《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頁 445-478，臺北：聯經出版。

¹⁰ 斯波義信、蔡家丘 (2009)，〈海洋史的效用〉，《漢學研究通訊》28 卷 3 期，頁 17-20。

¹¹ 楊國楨 (2009)，〈關於中國海洋史研究的理論思考〉，《海洋文化學刊》7 期，頁 1-8。